

“斯密问题”的三重意涵及其流变*

——兼论“斯密问题”何以为问题

王 欢 朱紫橙 杜丽群

摘 要：“斯密问题”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典问题之一。基于思想史编史学研究视角，本文先后考察了该问题的三个版本。其中，前两个较早提出的、基于文本分析的“法国联系论”和“二元人性论”版本，随着学术界对斯密生平著作的挖掘整理及其思想的整体性研究相继得到了澄清和解释。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历史论”版本又提出，“斯密问题”本质上反映着商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借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本文指出“斯密问题”成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对商业社会之利弊评判的不同侧重：斯密同时代的学者希望借助商业秩序来开创人类社会的新历史阶段；德国历史学派是为了批判英国经济学、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当代中国“斯密问题”的研究热潮则植根于市场化改革的特殊背景。究其本质，“斯密问题”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体现着不同分析范式及其背后社会秩序观之间的张力，而并非斯密自身思想体系或者论证逻辑的矛盾。

关键词：“斯密问题” 经济思想史 编史学研究 社会历史分析 当代中国

一、引言

亚当·斯密（Adam Smith）不仅以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以及道德

[作者简介] 王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wangh@cass.org.cn；朱紫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zhuzhicheng@pku.edu.cn；杜丽群（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duliquan@pku.edu.cn。

* 谨以此文纪念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

哲学教授的身份闻名于他的时代,^①更作为公认的经济学创始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而享誉盛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界“斯密复兴”(Smith renaissance)运动的兴起,斯密又以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形象,得到了来自经济学、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学者们一致的尊崇与敬仰。适逢斯密诞辰三百周年(1723—2023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我们有必要回头重新评估斯密的思想遗产,以及他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的回响,并思忖斯密的智慧对于我们当下的启示。

斯密生前仅出版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以下简称《国富论》),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智识成果和精神宝库中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由于这两本著作聚焦的领域与话题有所差异,在论证行文方面也有所区别,于是引发了后世两百多年的关注和讨论,并使得所谓“斯密问题”(Adam Smith problem)成为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就狭义而言,“斯密问题”聚焦斯密对人性的看法在这两本著作中是否矛盾,并由此引申出有关“利己-利他”“经济-伦理”等矛盾关系的广义的“斯密问题”。^②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根据对该问题“真伪性”的不同认识,自发形成了两派对立的观点,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作为持“真问题”立场的代表,卢森贝(Д. И. Розенберг)认为斯密是从同情心出发研究道德世界,从利己心出发研究经济世界(卢森贝,1959:243);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认为这两本著作具有内在差异,且斯密晚年对《道德情操论》的多次修订也未能使问题得到任何解决(Viner, 1927)。持有“伪问题”立场的学者,则以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的编辑戴维·拉斐尔(David D. Raphael)和亚历克·麦克菲(Alec L. Macfie)为代表,他们斥责这是“基于误解和无知的伪问题”(Raphael and Macfie, 1984: 20)。就长期学术论战的现象

① 斯密逝世时,《苏格兰人》杂志发布的讣告里提到了他的四重身份,分别是法学博士、伦敦和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苏格兰海关专员,以及格拉斯哥大学前道德哲学教授(*The Scots Magazine*, vol. LII, 1 July 1790, p. 363)。在斯密第一版《国富论》出版时的封面上,写的是他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和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Smith, 1981: 1)。

② 尽管这种拓展实质上已经基本脱离了斯密的原始思想,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赋予了“斯密问题”新的问题意涵和研究价值。

而言，国际学术界一百多年以来有关“斯密问题”争论的核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斯密问题”具有三种不同的意涵，并形成了三个版本——“法国联系论”“二元人性论”“社会历史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主张“斯密问题”是真问题。而以拉斐尔和麦克菲为代表的、持有“辩护论”观点的学者，则坚决否认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虽然国际学术界一百多年以来的讨论热火朝天，但是国内仅有陈岱孙（1998/1990）、朱绍文（1987，1990）等少数前辈学者较早地注意到了该问题，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学术界相关争论基本偃旗息鼓之时，国内突然兴起了关于“斯密问题”研究的高潮，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围绕《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或同情心）、经济学和伦理学等问题进行了热切的讨论，并形成了大量著作与论文。尽管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部分真知灼见，但是诚如罗卫东（2006：37）所言，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大多数作品鲜有创新，仅是对国际学术界已有观点的重复；二是不少文献错漏颇多，甚至还会重复已被证伪的误解或错误；三是大多数研究各抒己见，并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就此问题取得的进展。近十年来，尽管讨论的热潮已逐渐平息，但国内仍有许多学者对此问题保有热情，一些学者依然在就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性研究（比如：王国乡、李高阳，2015；刘清平，2019；朱富强，2019；高全喜，2022；等等），另一些学者则在从事其他主题研究时涉及此话题（叶坦，2021；杨芳，2023）。

总的来看，尽管学术界同仁已就“斯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且成果颇丰；但是从目前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仍有部分问题留待解决。首先，依然存在对“斯密问题”内涵认识的不同程度的曲解，比如错误地将《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等同于“利他”，进而将“斯密问题”阐述为“利己-利他”的矛盾；其次，尽管国内研究者注意到了国际斯密研究的成果，但是尚未有人关注到“斯密问题”的版本问题，特别是来自社会历史分析的视角；最后，绝大多数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斯密问题”及其真伪性本身，尚未挖掘该问题及相关争论的思想史价值。

本文认为“斯密问题”涉及的范围早已超出了斯密著作的文本与语境，也并不限于简单的“真伪性”问题；事实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之间围绕相关主题形成的长时段争论，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又极具代表性的学

术现象。因此，从经济思想编史学的视角出发考察“斯密问题”，^①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研究过度执着于“真伪性”的窠臼，也有助于我们开拓认识该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探讨一些新问题——如本文所关注的“斯密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即为何在斯密的时代没有人提出斯密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矛盾，却在后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此外，有关“斯密问题”何以为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还有助于本文结合中国知识界围绕“斯密问题”掀起研究热潮的时代背景，分析这类学术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斯密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性与启发意义。

二、文本分析视野中的“斯密问题”

（一）“法国联系论”及其消解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最早提出了“斯密问题”——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②从编史学的视角来看，“斯密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接涉及德国历史学派的两代学者，四位重要人物。在旧历史学派那里，^③“斯密问题”的面貌比较模糊，“法国联系论”思想也

① 李黎力和贾根良最早在国内提倡经济思想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 thought*）的研究，倡导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本身做思想史研究，即对其进行“史学史”（*history of history*）考察（李黎力、贾根良，2017）。

② 国内学者在具体人物、事件、著作及提出过程等细节上的认识存在差异。比如杨春学认为“斯密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中叶历史学派的诘难，“主要是海斯风克、莱昂和昂肯等人”（杨春学，1992）；罗卫东指出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卢霍·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维托尔德·冯·斯卡尔津斯基（Witold von Skarżyński）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卫东，2006：14—16）；王国乡、李高阳则将“斯密问题”的正式提出归功于斯卡尔津斯基（王国乡、李高阳，2015）。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统一。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最早勾勒出了历史学派批判“斯密问题”的前后脉络（Oncken，1897），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的“编辑导言”中沿用了这一脉络（Raphael and Macfie，1984：20—25），新近的一些研究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脉络（比如Montes，2003）。

③ 也有译作“老历史学派”。本文依据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译为“旧历史学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才刚刚萌芽。其中，希尔德布兰德注意到斯密两本著作间隐含的紧张关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斯密的“同情”仍以“利己心”为内核（Hildebrand, 1848: 275）；克尼斯则最早提及斯密可能的思想转变，他暗示斯密《国富论》中观点的变化与他的法国之旅之间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关系（Knies, 1853: 180）。十多年之后，新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和斯卡尔津斯基几乎于同时提出了所谓“斯密问题”。布伦塔诺认为，《国富论》表明不仅斯密完全吸收了克劳德·爱尔维修（Claude Helvétius）及其唯物论圈子“人类本性和自私作为人类行为唯一动力”的观点，而且斯密本人还是一位“重农主义者”（Brentano, 1877: 61）。斯卡尔津斯基更为激进，他主张两部著作都并非斯密的原创思想，而是外部影响的结果；他讽刺斯密在英国是唯心主义者，在法国之旅后又变成了唯物主义者（Skarzyński, 1878: 183）。

在德国学者的批评声和独特叙事中，斯密被塑造为一个没有原创性但高明的模仿者：他早年结合了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仁爱”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同情”，创作了《道德情操论》；在从1764年开始陪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经历了三年法国之旅后，斯密对人性的看法又被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和重农学派所影响，“自利”的概念成为《国富论》的人性论基础。这种将两部著作的内在矛盾主要归于斯密受法国之旅影响的观点，被罗素·尼利（Russell Nieli）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法国联系论”（French connection theory）（Nieli, 1986）。

虽然“斯密问题”最早以“法国联系论”的面貌出现在学术视野中，但是正如学者们后来所指出的——他们不过是“基于对斯密意图的错误假设和对斯密全部作品的无知”（Göçmen, 2007: 7）。从斯密本人的意图和论述来看，他显然不认为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任何的矛盾或者明显的转换；毋宁说，这两部著作都是他的一个涉及道德、政府、法律和历史的更广泛的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斯密在1790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告读者”中指出，《国富论》一书部分地实现了他在第一版《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写作计划，即“说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他也略带遗憾地指出，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完成长期以来的包括法理学部分在内的伟大计划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Smith, 1984: 3）。此外，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后仍然不停地从事《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而他在1776年之后出版的两个新版本中，也并没有改变他以“同情”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反而还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它。因

此，“法国联系论”主张的斯密因法国之旅而转变思想的控诉，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与斯密有关的资料被不断地挖掘出来，对斯密学术成果的系统性研究也由此开始。在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 D.*, 1793）的基础上，约翰·雷（John Rae）结合新发现的资料对斯密生平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而通过这本《亚当·斯密的一生》（*Life of Adam Smith*, 1895），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国之旅前的两年，即1762—1763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道德哲学课程时，就已经发表过与《国富论》内容有关的演讲；此外，早在1755年，斯密就已经向学生们阐述了他的“自然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并宣称自己是“这一体系的创造者”（Rae, 1895: 116—121）。斯图尔特也曾提及这一点：据斯密自己的说法，他在1751年正式前往格拉斯哥大学授课前，就在爱丁堡的课堂上讲过相关的内容（Stewart, 1982: 321—322）。此外，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新发现的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笔记也提供了反驳“法国联系论”的充分证据。我们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189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与《国富论》中那段以“自利”而非“仁爱”来获得面包师或酿酒师的服务的著名论述相一致的表述（Smith, 1896: 169）。

19世纪中叶，德国学者以“法国联系论”为借口对斯密进行了激烈批判，而19世纪末，英国学者借由对斯密学术成果和思想的整理和再发现反驳了前者。从时间上看，仿佛这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你来我往的争论和回应，但这两个事件其实完全是相互独立的。坎南等英国学者压根没有注意到所谓“斯密问题”，直到1897年，欧洲的相关争议才由德国学者翁肯最早介绍到英语学术世界中。在名为《亚当·斯密的一致性》（*The Consistency of Adam Smith*）的论文中，翁肯先引述了德国学者的批判性观点，然后分别援引斯密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序言、雷编写的新传记、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编制的斯密的藏书目录，以及坎南发表的法理学讲义中的有关证据，对这个最初版本的“斯密问题”给予了全面反驳（Oncken, 1897）。至此，“法国联系论”旋即在新发现的证据面前消解了。

（二）“二元论”与“辩护论”的争议

尽管斯密本人的写作计划和新发现的课程讲义等材料可以充分地反驳来自“法国联系论”的诘难，但是“法国联系论”的消解并不意味着“斯密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一个相对弱化的、折衷的“斯密问题”版本，即认为斯密在两本著作中强调的人性观并不相同的“二元人性论”版本，逐渐成为新的主流观点。不同于德国历史学派借助人性论矛盾来贬低和质疑斯密的做法，支持“二元论”的学者认为斯密作品中表现出的人性观的区别，来源于一种“二元证成法”（the dualist justificatory approach），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勒（Henry Thomas Buckle）是“二元论”最早的代表，^①他认为斯密只不过是在同一个主题下采取了两条不同的论证路线：在《国富论》中，斯密简化了人性中的“同情”，并用“利己”来作为经济领域社会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恢复了被简化的“同情”的部分，用于服务伦理领域的社会关系（Buckle, 1970: 351）。因此，巴克勒主张在理解斯密的思想体系时，这两部作品应该互为补充（Buckle, 1861: 432, 437）。翁肯也认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观其实是斯密有意识地以二元论的形式分开的，这与康德使用的方法很类似；只不过康德是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发展他的伦理学解释，而斯密的伦理学则建立在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础上（Oncken, 1877: 61）。尽管“二元论”解读注意到了斯密思想的整体性，但实际上也为那种将两本著作相分离的解读方式提供了基础——既然斯密两部著作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那么不妨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阅读《国富论》，研究伦理问题时阅读《道德情操论》。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离化趋势，学科界限越来越分明，这种“二元论”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斯密问题”最为持久和顽固的版本。前文提到的卢森贝和瓦伊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斯密问题”的看法，就是非常典型的“二元论”解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界“斯密复兴”的运动拉开了帷幕。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麦克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以《道德情操论》和《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1795）为基础，对斯密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

① 巴克勒所著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恰好是19世纪中叶德国知识界了解斯密思想的主要来源，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斯卡尔津斯基直接批判的对象。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的编撰工作掀开帷幕,国际斯密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Recktenwald, 1978; Tribe, 1999)。在此期间,一批采取“辩护论”立场的学者从文本出发系统性地澄清了斯密所使用的术语,进而彻底驳斥了那种认为斯密两部著作存在人性论矛盾的观点。作为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的编辑,拉斐尔和麦克菲直接批判了历史学派的“法国联系论”和巴克尔的“二元论”,宣称这不过是“基于误解和无知的伪问题”。他们强调斯密在这两本著作中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解并无不同,只不过《国富论》的讨论范围稍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处理得更详细罢了。斯密在强调自动动机时,主要但绝不是全部只针对经济活动;斯密也绝对不否认道德、仁爱之人的存在。就论证思路而言,一方面,他们延续了消解“法国联系论”的那些论据,反驳了斯卡尔津斯基等人的无知;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方法论和文本的角度出发,澄清了巴克尔对斯密方法的误解,以及斯密文本中“同情”(sympathy)、“自利”(self-interest)、“自爱”(self-love)、“自私”(selfish)等术语的内涵。两位编辑着重指出,“同情”在《道德情操论》中是道德判断的核心,而不是人类行为的动机;“自利”则必须和那种为了自身利益无视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私”相区分(Raphael and Macfie, 1984: 20—25)。

“斯密复兴”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从系统性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把握两本著作间的关系:麦克菲主张《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所隐含的哲学原则在经济领域的特例,为《道德情操论》里阐明的“自爱”在经济方面的运行提供了适当的位置(Macfie, 1967: 75—76);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认为《道德情操论》包含了斯密的普遍道德理论,它始终比《国富论》在更高的理论普遍性上运作,后者可以视为前者包含的一般社会行为在经济领域的专门应用(Winch, 1978: 10)。“辩护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追随: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指出,“斯密问题”被夸大了,甚至是想象中的(Hutchison, 1976);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指出,“斯密问题”是对同情和自利的误解(Skinner, 1976);温奇总结道,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一致,即不存在“斯密问题”(Winch, 1978: 10)。

这一时期,出于一种不要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中去的想法或共识,这一曾经被讨论得风生水起的学术话题突然偃旗息鼓了,“斯密问题”已经过时的观点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Recktenwald, 1978; Heilbroner, 1982)。

三、社会历史分析视野中的“斯密问题”

(一) “社会历史论”与新启发

在“辩护论”成为斯密研究的主流观点后，那种对“利己-利他”“自利-同情”等概念范畴的误读得到了澄清，事关两种人性论的“斯密问题”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然而，由于“斯密问题”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局限于“法国联系论”或“二元人性论”的狭义理解，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从伦理学角度解释斯密的学者认为“辩护论”对“同情”的处理过于简化了，而应该更深入地去探讨人性和道德的问题；^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辩护论”的处理过于敷衍，忽视了“斯密问题”对于理解斯密的学术思想来说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Teichgraeber, 1981）。后一批学者的立场被归为“社会历史论”，他们主张用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去理解斯密以及他所继承的公民人文传统。虽然这些学者基本赞成“辩护论”对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和澄清，支持“斯密问题”不应当被归咎为斯密本人的故意或者失误；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伪问题”的提法掩盖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线索，特别是基于人性与伦理的道德诉求同商业社会的新兴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他们强调，在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现实的“斯密问题”，反映着商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Göçmen, 2007: 15—17）。

尽管支持“社会历史论”的学者们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有分歧，但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斯密的意图与学说，是他们所共同遵循的方法；某种意义上，这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方法也恰是斯密本人的研究方法。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很早就注意到在斯密的“四阶段”理论中所体现出社会性和历史性分析特征，他指出商业社会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首先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社会形态（Meek, 1977: 24—28）。理查德·泰希格雷伯

^① 这些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还是借助文本方法，只是选择从形而上学、自然神学等角度去重新理解和解读斯密的思想体系（包括两本著作的关系、“同情”的理解、“斯密问题”是否成立等）。考虑到这些理解相当多元、分歧颇大，与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无关，故不再赘述。相关综述可以参见 Montes（2003）、罗卫东（2006: 31—36）等。

(Richard Teichgraeber) 考察了斯密之于欧洲传统社会进步和政治哲学发展的贡献, 并发现斯密论证了商业和道德并不矛盾, 而这并不同于过去西方的公民美德传统 (Teichgraeber, 1981)。约瑟夫·克罗普西 (Joseph Cropsey) 从社会历史需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指出, 相较于中世纪时期的美德统治, 商业社会是人性自由发展所需要的; 斯密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是进步的, 乃是因为它能使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成为可能。不过斯密同时也注意到了商业社会与自然自由体系之间的张力 (Cropsey, 1957: 1—5, 1975: 139)。相比于此前占主导的文本分析思路, 社会历史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将斯密问题“文字游戏化”的风险——脱离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去解构与重构概念和术语, 不仅会让研究者失去对斯密本身思想体系的把握, 还会使得理论思想的价值脱钩于现实生活的关切。

正是得益于这一分析视野的启发, 本文注意到此前学术界因执着于“真伪性”之判断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即无论是斯密本人, 还是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 都没有提出过有关“斯密问题”的困惑与质疑, 但是在斯密去世之后, 这个问题却成为此后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过去也曾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比如里夏德·蔡斯 (Richard Zeyss) 就提到, 没有人在斯密的有生之年认为《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存在脱节, 包括斯密的挚友和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休谟在内 (Zeyss, 1889: 92); 尼利也写道, 斯密同时代的学者并不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人性假设或哲学上存在任何矛盾 (Nieli, 1986)。但是遗憾的是, 蔡斯和尼利的注意力也被“真伪性”问题所分散, 仅仅将这一观察视为反驳“斯密问题”的证据, 而并未就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给予必要的讨论。

从社会历史分析的视野来看, 要回答“斯密问题”何以为问题, 就需要进入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所面临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 分别探讨为何“斯密问题”对斯密及同时代的学者来说并无矛盾之处, 又为何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眼中成为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二) “斯密问题”何以为“问题”?

正如拉斐尔和麦克菲等人提请读者注意的那样, 斯密的文本语境中使用的“自利”和“自私”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涵, “自利”绝对不是“不讲道德”的同义词, 更不能和“损人利己”联系在一起。就文本分析的意义来

说，这一区分从根本上廓清了历史学派在学术史上所铸就的那种误解。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分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分析价值：它不但证明了斯密时代的学者对于“自利”有一致的共识，而且从侧面表明当时的学者其实也很清楚，完全自私的利己和社会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着张力；否则，他们便没有必要再对“自利”和“自私”加以甄别了。据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同“社会历史论”的观点——即便是对斯密本人来说，那种与他的思想体系无关的、广义的“斯密问题”，即人的自利动机和社会道德需要之间的内在张力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点在斯密晚年对《道德情操论》的若干重大修改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①

如果我们将斯密的观点和诉求放回他所处的时代，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时代背景，那么就会注意到弗朗西斯·哈奇森、休谟、斯密等人所提倡的道德情感主义（moral sentimentalism），本身就带有反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等人所推崇的利己主义的浓厚色彩。在他们当中，尤其以斯密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为甚，他本人持有很强的推崇“仁爱”、反对“自利”的倾向。在哈奇森看来，对德性的追求并非出自追求者的利益或自爱，或与他自己益处有关的某种动机，“仁爱”才是道德行为的唯一动机（Hutcheson, 2004: 102）。部分地因为哈奇森这种反对利己主义的强烈倾向，使得斯卡尔津斯基误以为斯密作为哈奇森的弟子，在法国之旅前是个纯粹的道德主义者。事实上，在面对这种“道德”和“自利”的张力时，休谟和斯密都没有延续哈奇森那种极端的道德主义立场。休谟认为道德秩序本质上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他充分重视“自利”这种自然情感，并指出人们自私的倾向和有限的慷慨势必会导致冲突。因此，休谟主张必须用人为缔约的方式来促成私人利益向社会公益的转化（Hume, 2007: 307—315）。对于斯密来说，即便我们不去援引他在《国富论》中那些肯定“自利”的著名论述，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明确承认——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自我关心和自我照看是恰当和正确的（Smith, 1984: 82—83）。但是，斯密也并不认同光谱另一端的曼德维尔所拥护的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他指出，那种“放纵堕落的体系”（licentious

① 斯密本人对自然自由体系的商业社会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幸福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对于商业社会出路的悲观态度逐步促使他愈发重视道德情感败坏的问题（罗卫东，2023）。

systems) 似乎要完全抹杀罪恶和美德之间的区别, 其倾向十分有害 (Smith, 1984: 308)。类似的态度也体现在斯密对商业社会道德问题的反思上。斯密指出, 商业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爱和感情, 只有更少的幸福和友善 (Smith, 1984: 85—86); 他还批判商人们卑鄙的贪欲和垄断的精神, 也担忧分工细化后单调的生活会牺牲人们在智力、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美德 (Smith, 1981: 493, 781—782)。

从斯密本人的观点来说, 作为商业社会的理论家, 他既不认同干脆放弃道德秩序而完全任由自利动机来主导人类的行为, 又不认同因畏惧潜在的道德败坏风险就放弃走上那条商业社会的文明道路。从斯密的选择来看, 他主张在对道德问题保持警惕, 同时维持必要干预的前提下, 积极地走上那条通往商业社会的道路。这一选择并非因为斯密的盲目乐观, 也并不是因为斯密不知道商业社会的文明形态不一定会按照他推崇的“自然自由体系”的方向发展; 而是因为面对当时的时代状况时, 这样一种前进的而非后退的道路, 不仅符合苏格兰学者有关社会进步的历史观, 还符合苏格兰启蒙运动关于国家和人类社会前途的信念。并且, 相较于那种退回到过去的旧道德世界以及旧政治经济秩序的“老路”, 这条新道路所描画的商业社会的蓝图, 显然要更接近于斯密设想的“自然自由体系”。这也正是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或明或暗地表达他关于教会的制度、政府的骚扰、君主的恣意, 以及禁欲主义道德观等内容的不满与批评的原因。相较于那种建立在限制人 (特别是普通人) 的自由发展的旧道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 斯密的选择是重新建立一套新的道德原则, 用它来调和商业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 “社会历史论”的学者们才会注意到, 斯密本人并未完全抛弃传统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词汇, 而是从更有利于商业社会发展的角度赋予其新的含义。斯密对“美德”所作的一般化处理, 放弃了对其所有表现形式单一的理想化追求, 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 同情被转化为自我克制和自律, 对经济自利的认可则取代了对美德的偏执向往 (Teichgraeber, 1981)。在这套新的道德体系中, “正义”不再是形而上的观念, 而是法律与规则; “美德”不再是君子和智者特有的理性, 而是人的行为受到“公正的旁观者”影响产生的共鸣 (Cropsey, 1957: 17—25)。

对于斯密来说, 商业社会的新秩序和传统社会的旧秩序之间的矛盾, 反映在道德哲学领域就是新、旧两种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 某种程度上, 新兴的利己主义和传统的道德禁欲主义之间的矛盾, 就反映着斯密的时代所存在

的广义的“斯密问题”。在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转型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斯密选择了放弃旧的道德秩序，在保持谨慎和克制的前提下积极拥抱商业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新阶段。对于斯密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来说，所谓狭义的“斯密问题”之所以不足以成为“问题”，根源在于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就是他站在人类历史命运的转折点，面对道德和利己的张力时，给出的解决方案。究其本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共同构成了斯密对于广义的“斯密问题”的回答；而从其作为“回答”的性质来说，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彻底地厘清“斯密问题”在狭义上不成为问题，在广义上却构成问题的逻辑结构。只不过相比于商业社会未来可能存在的道德和自利之间的潜在矛盾，斯密等商业社会理论家更为关心的还是迫在眉睫的时代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应当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及应当如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后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确如斯密所展望的那样，自由主义的信条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扩张，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全都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商业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历史的发展向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条道路并没有完全同斯密预想的一样，无论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致力于发展的商业社会的道德体系，还是他在整个伟大的写作计划中设想的“自然自由体系”，都被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就结果而言，《国富论》一度成为斯密最著名、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最显赫的学问，“看不见的手”和自由主义则逐渐成为“自然自由体系”的主体乃至全部内容。于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斯密的形象被塑造为“经济学之父”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代言人”，并以这种形象走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面前。

19世纪中叶，德国（德意志）还在国家尚未统一、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封建贵族势力顽固、民族工业脆弱的艰难境地中挣扎，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却帮助英国的制造业与贸易主导了全世界。^①在这种经济实力的悬殊差距和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下，德国学者开始拒绝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寻找更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道路。将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想法，

① 彼时德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都面临着来自英国的巨大压力：在国内市场上，德国面临英国产品的竞争，勉强维持着自身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德国本就不大的市场份额还要受到英国的覬覦和蚕食（马赛厄斯、波斯坦，2004：481）。

成为当时德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深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率先指出，自由放任对英国有利，但不利于德国；他在抨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提出保护性关税和促进工业发展的战略（李斯特，1961：119—132）。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哲学家约翰·菲希特（Johann Fichte）甚至激进地主张，政府应该禁止对外贸易（Fichte，1800）。于是乎，德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以及两国之间紧张加剧的关系，使得斯密这位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历史学派口诛笔伐的对象——斯密被看作“片面的英国经济利益的代表”，他的学说被误读为“抽象世界主义”；德国学者控诉斯密试图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特征，通过单个国家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情况推导出一般性公理，进而创造一种“世界和人类的政治经济学”（Montes，2003）。

到了新历史学派兴盛的时代，得益于前一个阶段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抨击和成功施行的工业化政策，德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进一步增长，但是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正式进入了德国学者的视野。1873年，以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开始着手对社会问题的解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当初早已预言了的商业社会可能会出现道德败坏，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这批延续着旧历史学派“斯密批判”之传统的学者所面对的现实。于是，他们不仅捍卫和发展了旧历史学派的“直觉”，还更进一步地损害了斯密的声誉（Montes，2003）。

正是在术语的误读、学说的曲解、社会的矛盾、现实的关切等条件的共同作用之下，国际学术界争论了一百多年的所谓“斯密问题”应运而生，而斯密本人有关广义的“斯密问题”的回答，则被遗落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

四、“斯密问题”与当代中国

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英国和德国的学者内部普遍对斯密的形象有着较为统一的认识；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斯密形象的认识则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也因此产生了与国际学术界“斯密问题”研究相当迥异的学术现象。

民国时期，以严复翻译并出版《原富》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斯密的思

想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彼时，斯密的学说更多地被看作指导国民经济走向富强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对斯密的有关认识主要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有关观点的延续，斯密也更多地被看作劳动价值论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而当中国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著作和思想再度被陆续引介到国内，斯密的形象又转变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宗师”（朱绍文，2000：75—89；罗卫东，2016）。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方面受中国学者对斯密形象不同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恰好同市场化改革后社会经济层面出现的现实问题相呼应，“斯密问题”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斯密的多元化认识、对现实问题的多维关怀，以及国际学术界斯密研究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又进一步强化了因“斯密问题”而引发的学术论战的激烈程度。在这场学术论战中，既有学者严格按照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辨别狭义的“斯密问题”，也有学者从更强调现实关怀的角度去争论广义的“斯密问题”；也就是说，过去学术史上有关“斯密问题”的间歇式的争论，突然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集中式地爆发了。

在狭义斯密问题的研究中，“真伪性”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也大多围绕“二元论”和“辩护论”这两种立场而展开。持有“二元论”立场的学者主张，斯密在谈论经济问题时秉持“自利”的人性假设，在讨论非经济问题时则强调“同情”或其他道德情感（如“利他”）。比如，杨春学（1992）认为，斯密探讨经济和非经济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行为假设；万俊人（2000：7）认为，这出自经济学与伦理学对人性的不同方面的考量。持有“辩护论”立场的学者主张“斯密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或者“假象”。比如，陈岱孙（1998：258—263）强调，斯密时代并没有所谓经济和伦理的学科区别，两本著作的内容更是有其互通之处；朱绍文（1987，2010）则直接援引了拉斐尔和麦克菲的研究成果，宣告斯密问题只是一个“伪问题”；胡怀国（1999）、蒋自强（2014：i—xx）等人则从斯密的写作计划、两部著作的修订顺序、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应的概念体系等诸多角度出发进行考察，最终得出两部著作之间高度一致、不存在所谓内在矛盾的结论。

在广义斯密问题的研究中，该问题因其特殊的现实意义而演变出类似于“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以及“如何处理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学术性与社会性辩题。论辩双方以《读书》杂志为主要平台，展开了多年的思想交锋，也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以樊纲（1998）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注重价值中立，要与道德问题一刀两断，而不是试图改变人性。另一派反对的观点则强调，经济学不可能彻底地脱离道德问题，也不可能彻底地脱离价值判断；从学术研究和现实关切的角度而言，经济学反而应当从制度研究和制度重建的角度出发，主动涉及道德问题。后续争论逐渐上升到经济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层面。比如，罗卫东（2001）指出，所谓“经济学不讲道德”其实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当作了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又把道德问题粗浅地理解为“好坏”问题；姚新勇（1998）也指出，所谓对当时国内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批评，实质并不是指责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不谈论道德问题，而重在对他们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脱离中国具体改革实践的批评。

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这一轮社会思潮的激烈交锋主要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出现了一系列反映道德危机的事件。其中既包括制度运行层面的贪污腐败、经济犯罪等问题，也包括市场交易层面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现象，更包括国民素质层面的拜金主义、诚信危机，甚至道德败坏、目无法纪。对于这些棘手的社会现象，一些学者认为“私欲-道德”“利己-利他”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着市场经济的内部矛盾（梁小民，1998）。另外一些学者则意识到社会的秩序基础发生了变化，原来传统社会的道德约束已不再能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的社会条件（张静，1997；张曙光，1999）。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社会关注的背后是对全面商业化的道德前景的怀疑，这一方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伦理秩序的强调，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倡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有关（罗卫东，2016）。

某种程度上，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对“斯密问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关切重新进行考察和反思，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受篇幅所限，本文这里仅对“斯密问题”的中国样本作一简单评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特殊背景下，或者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社会成分和内在矛盾。如果与斯密问题的国际样本相呼应，那么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既涉及斯密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传统秩序衰落后该如何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国家和国民的现代秩序；又涉及德国历史学派所面临的问题，即在既有的经济政治的国际秩序与格局下，后发国家如何在实现本国发展与赶超的同时，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当

代中国的国情远比英国和德国当时的状况要复杂得多。除了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的部分共性之外，我国在历史、文化、制度等诸多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的社会转型经验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的实践。此外，当下世界结构调整与中国社会转型相叠加，自由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受挫，在破除西方发展模式之“神话”的同时也改变了全球紧密合作的局面；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方兴未艾，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波动的波动与不确定性。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而言，当下不仅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新的历史转折点。

五、结论与启示

经过对“斯密问题”三重意涵的编史学研究，本文详细地梳理了有关“斯密问题”提出与争论的历史过程，既澄清了从文本分析视野出发的“法国联系论”和“二元人性论”对斯密本人思想的相关误解，也指出了“社会历史论”所涵盖的广义的“斯密问题”才是该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斯密的两部著作恰好可以被看作他本人对于广义“斯密问题”的解答——这一叙事一方面肯定了广义斯密问题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消解了狭义斯密问题的存在基础，可谓本文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无论是斯密本人、德国历史学派，还是中国学者，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商业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所赖以建立的这套新秩序与传统的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过于强调利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只不过，当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面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些学者无法就诸如对市场的信心、对未来的前景等问题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围绕“斯密问题”进行了一百多年的争论，正是因为这种市场秩序和道德秩序间的内在矛盾，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题。遗憾的是，大多数学者更多地站在了片面强调差别与对立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忽略了社会历史条件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进而未能正确把握“斯密问题”实质内涵的普遍性与根本性所在。究其本质，“斯密问题”是不同分析范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张力，是商业社会内在矛盾的反映，而并不是斯密自身思想体系或者论证逻辑的矛盾；也就是说，“斯密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文本性问题，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

物。之所以过去的讨论往往容易陷入“文字游戏”的“陷阱”，或者干脆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之争，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采用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立场，他们既没有准确地把握斯密本人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关切，也没能正确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认识到不同时代和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的“市场与道德之争”。

站在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重新回顾国内外学者有关“斯密问题”的百年争论，特别是将不同学者各自所持的观点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斯密的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感悟与启示。

首先，斯密的思想至今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但现有研究对斯密思想遗产的挖掘和把握还远远不够。我们之所以要纪念斯密诞辰300周年，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斯密在他生前或者身后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或荣誉，而是斯密的思想智慧并未过时，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客观地说，斯密的思想体系远比“看不见的手”或者古典自由主义要丰富和复杂，但是如今学术界对于斯密整体思想的认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关“斯密问题”的文本性争议也说明后世学者对斯密著作和生平只有泛泛的了解，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着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其次，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与关注“斯密问题”所反映的实质，即商业社会秩序的内在张力。尽管狭义的“斯密问题”可以被看作“伪问题”，但是广义的“斯密问题”却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初期，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利己-利他”“经济-伦理”“个人-社会”“效率-公平”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和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市场秩序的内在矛盾与张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和处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机会平等、分配正义等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系统性地利用市场机制、道德规范、制度约束等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遗产中得到的启发，也是未来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最后，中国学者应当充分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对“斯密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

来看，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经济学家都首先要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国情，致力于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任何因循守旧的想法，或者生搬硬套的思路，都是无益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事业的。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学学者更需要承担起时代和国家赋予的责任，在从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性和科学性角度出发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所在，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立场，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经验，不断深化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参考文献：

- 陈岱孙，1998，《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载晏智杰、唐斯复编《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福建人民出版社。
- 樊纲，1998，《“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第6期。
- 高全喜，2022，《思想史中的“斯密问题”》，《读书》第4期。
- 胡怀国，1999，《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斯密问题”略论》，《经济科学》第4期。
- 蒋自强，2014，《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载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1卷《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
- 李黎力、贾根良，2017，《经济思想编史学：学科性质、内容与意义》，《经济动态》第11期。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196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百受校，商务印书馆。
- 梁小民，1998，《亚当·斯密问题之解》，《读书》第10期。
- 刘清平，2019，《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何以可能？——斯密悖论新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卢森贝，1959，《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李侠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罗卫东，2001，《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第5期。
- 罗卫东，2006，《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罗卫东，2016，《政治与学术之间：亚当·斯密形象在中国的变迁》，《南国学术》第4期。
- 罗卫东，2023，《亚当·斯密晚年对自由放任思想的反思——基于〈道德情操论〉版本的考察》，《经济思想史学刊》第2期。
- 马赛厄斯，彼得、M. M. 波斯坦主编，2004，《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徐强、李军、马宏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万俊人，2000，《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 王国乡、李高阳, 2015, 《“斯密问题”的终结——兼论“茅于軾问题”的破解》, 《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 杨春学, 1992, 《关于经济学史上的“A·斯密问题”及其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第4期。
- 杨芳, 2023, 《英语世界亚当·斯密研究七十年》, 《经济思想史学刊》第1期。
- 姚新勇, 1998, 《“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 《读书》第11期。
- 叶坦, 2021, 《“中学西渐”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立足于经济学术史的考察》, 《经济思想史学刊》第1期。
- 张静, 1997, 《经济: 道德? 不道德?》, 《读书》第11期。
- 张曙光, 1999, 《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读书》第1期。
- 朱富强, 2019, 《斯密人性悖论及其内在统一性——勿将现代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归源于斯密的自利人》,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 朱绍文, 1987, 《〈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 《经济研究》第7期。
- 朱绍文, 1990, 《亚当·史密斯与当代——出席名古屋纪念亚当·史密斯逝世200周年国际讨论会侧记》, 《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朱绍文, 2000, 《亚当·斯密与现代中国——纪念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 载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朱绍文, 2010, 《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与所谓“斯密问题”》,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Brentano, Lujo. 1877. *Das Arbeitsverhältniss gemäss dem heutigen Recht. Geschichtliche und ökonomische Studien.*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oldt.
- Buckle, Henry T. 1861.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 2.* London: Parker, Son, and Bourn.
- Buckle, Henry T. 1970. *On Scotland and the Scotch Intellect*, edited by H. J. Hanha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psey, Joseph. 1957. *Polity and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Adam Smith.*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Hagu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Cropsey, Joseph. 1975. “Adam Sm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Essay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Andrew S. Skinner, and Thomas Wilson, pp. 132 – 15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ichte, Johann G. 1800. *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als Anhang zur Rechtslehre.* Tübingen: J. G. Cotta.
- Göçmen, Doğan. 2007. *The Adam Smith Problem: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 Heilbroner, Robert L. 1982.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Adam Smi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4 (3): 427–439.

- Hildebrand, Bruno. 1848.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Frankfurt: J. Rütten.
- Hume, David. 2007.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A Critical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Fate Norton, and Mary J. Nor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tcheson, Francis. 2004.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in Two Treatises*, edited by Wolfgang Leidhol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Hutchison, Terence W. 1976. “The Bicentenary of Adam Smith.” *The Economic Journal* 86 (343): 481–492.
- Knies, Karl. 1853. *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m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liche Methode*. Braunschweig: C. A. Schwetschke und Sohn (M. Bruhn).
- Macfie, Alec L. 1967. “Adam Smith’s *Moral Sentiments* as Foundation for His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Paper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Alec L. Macfie, pp. 59–81.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Meek, Ronald L. 1977. *Smith, Marx, &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New York: Chapman & Hall.
- Montes, Leonidas. 2003. “Das Adam Smith Problem: Its Origins, the Stages of the Current Debate, and One Implicat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 (1): 63–90.
- Nieli, Russell. 1986. “Spheres of Intimacy and the Adam Smith Probl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 (4): 611–624.
- Oncken, August. 1877. *Adam Smith und Immanuel Kant. Der Einklang und das Wechselverhältnis ihrer Lehren über Sitte*. Leipzig: Staat und Wirtschaft.
- Oncken, August. 1897. “The Consistency of Adam Smith.” *The Economic Journal* 7 (27): 443–450.
- Rae, John. 1895.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 Co.
- Raphael, David D., and Alec L. Macfie. 1984. “Introduction.” In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avid D. Raphael, and Alec L. Macfie, pp. 1–52.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Recktenwald, Horst C. 1978. “An Adam Smith Renaissance Anno 1976? The Bicentenary Output—A Reappraisal of His Schola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6 (1): 56–83.
- Skarżyński, Witold von. 1878. *Adam Smith als Moralphilosoph und Schoepfer der Nationaloekonomi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Berlin: Verlag und Theobald Grieben.
- Skinner, Andrew S. 1976. “Adam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2): 111–132.

- Smith, Adam. 1896.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edited by Edwin Cann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mith, Adam. 1981.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oy H. Campbell, and Andrew S. Skinner.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Smith, Adam. 1984.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avid D. Raphael, and Alec L. Macfie.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Stewart, Dugald. 1982.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 D.*, edited by I. S. Ross. In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written by Adam Smith, edited by William P. D. Wightman, and James C. Bryce, pp. 263 – 351.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Teichgraeber III, Richard F. 1981. “Rethinking Das Adam Smith Problem.”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 (2): 106 – 123.
- Tribe, Keith. 1999. “Adam Smith: Critical Theoris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2): 609 – 632.
- Viner, Jacob. 1927.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 (2): 198 – 232.
- Winch, Donald.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eyss, Richard. 1889. *Adam Smith und der Eigennutz.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r älteren Nationalökonomie*. Tübingen: Verlag der H. Laupp’schen Buchhandlung.

The Triple Meaning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and Its Evolution: What Makes the “Adam Smith Problem” a Problem

Wang Huan^a, Zhu Zicheng^b and Du Liqun^c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bc})

Abstract: The “Adam Smith problem” is a classic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the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versions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in succession. Among them, the former two versions, “French Connection Theory” and “Dualistic Humanism”, which were initi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analysis, have been clarified and explained through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Smith's life, writings, and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The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which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further asserts that the “Adam Smith problem”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commercial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as a problem lie in the different focuses of scholars on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commercial society under different socio-historical conditions: Smit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imed to create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human society through the commercial order;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was tasked with criticizing the British economics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he boom in the study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lso a special phenomenon reflecting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is a product of specific socio-historical conditions, reflec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different analytical paradigms and the social order behind them, rather than contradictions in Smith's own ideological system or logic of argumentation.

Keywords: “Adam Smith Problem”,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Contemporary China

JEL Classification: A11, A13, B12, Z13

(责任编辑: 王姣娜)